



# 春林阶级谱

中国文联出版社  
北京

www.duxiu.com

编号：(湘)2622

## 春 华 阶 级 谱

---

編者：中共春华山人民公社委员会  
春华山人民公社贫农下中农协会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)  
长沙市新村路

印刷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 
长沙市兴汉门口

发行者：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：2 5/16 插页：1

字数：33,000

1964年7月第 一 版

1964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—10,100

## 序 言

这本书是长沙县春华山公社从阶级谱中选出来的。

春华山公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办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由公社党委、大队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组织，发动群众编成了大队和公社的阶级谱。阶级谱包括本队、本社的简史；包括一部分贫、下中农的家史记录；还包括全队、全社分户的阶级成分清册。他们把阶级谱作为阶级斗争的史料，规定要永远保存，定期续谱；他们把阶级谱作为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，规定要经常拿出来学习和温习。他们这种做法，是留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好方法。

这本书里，虽然只是农村阶级斗争中一些普通的故事，文字也比较简略，但可贵的是农民自己的文章，记载了他们血和泪的回忆和当家作主的喜悦，是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和传统留传下去的生动纪实，是他们阶级感情迸裂的火花。每篇材

料都包含着对旧社会的控诉,和对新社会的热爱;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,和对阶级敌人的警惕;显示了贫、下中农高度的阶级自觉,和跟着党走的坚强决心。

这本书献给农村的读者,可以作为一面镜子。春华山贫、下中农的经历,正是我们大家的经历;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,同样是我们共有的认识;他们把阶级斗争的传统留下来,同样也是我们共同的要求。

这本书献给青少年读者,可以作为一个活教材。春华山地区的今昔和十多户贫、下中农的遭遇,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老一辈受的苦难和老一辈干的事业,告诉我们如何认识阶级斗争,鼓励我们把阶级斗争的传统接到手。

关心和研究农村的人也可以看看这本书。春华山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民公社,但是从一个小的地域里,可以观察到整个农村情况的伟大变迁。

这些,就是我介绍《春华阶级谱》一书的原因。

史 平

一九六四年五月

## 目 录

春华今昔·····	(1)
子子孙孙跟党走·····	(21)
我要留着讨米袋·····	(25)
我是扶着讨米棍长大的·····	(28)
一亩田·····	(33)
卖身记·····	(36)
三桩仇恨·····	(40)
不忘做长工的苦处·····	(45)
一副棺材 三年劳役·····	(49)
我立过活人碑·····	(53)
一张筒车·····	(56)
两代聋子·····	(60)
我父亲的一生·····	(63)
识破地主分子的两副嘴脸·····	(66)

# 春 华 今 昔

中共春华山人民公社委员会  
春华山人民公社贫农、下中农协会

一九六三年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全社贫农、下中农回忆对比，诉苦思甜，大谈社史、村史、家史，各大队修了阶级谱，这是一桩大喜事。正如新塘大队南屋嘴片修谱大会上写的对子所形容的：“欢欣鼓舞，重修阶级谱；声震云霄，再庆翻身乐”。现在我们把全社的情况写出来，保存下去。我们自己可以经常拿出来回忆回忆，我们的子孙，可以经常拿出来学习学习。我们留下四句话：

代代相传，莫忘过去；人人发愤，建设春华。

## 春华山过去是个苦地方

现在的春华山，有二万六千亩田，二万亩山，田里出谷，山上出木，水里出鱼。全公社三千八百户，一万五千人，现在有吃有穿，欢欢喜喜地搞社会主义建设。可是过去的春华山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春华山过去有两多：灾难多，穷人多。以春华大队为例，现在的一百二十四户中，当时就有六十四户做长工，有五十二户讨过米，有三户卖儿卖女，七十八人没有棉衣，十五户没有棉被。

那时，春华山的农民为什么这样穷呢？并不是地方不好，而是地主阶级、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些吸血鬼，把农民身上的血都吸干了。

“穷人头上两把刀，租子重来利息高。”地租剥削是穷人头上的头一把刀。

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部分土地，高租重押，剥削农民。高峯大队二百二十八户中，地主富农只有十三户，却占田一千一百三十三亩，占田亩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；贫雇农一百二十六户，只占田一百零五亩，占田亩总数的百分之六。地主胡海云一家就霸占了千多亩田，地主王沛林九代没有脱过鞋袜，地主陈世介每年收租两千多石，家里请三个长工、五个女工。

农民没有田，要到地主手里去租。每亩田每年要交租两石四斗，每石租还要交一石谷的押金。农民往往是未镰上壁，就没饭吃。碰上水旱年成，地主逼租，如狼似虎。夺佃，搜家，逼得农民卖儿卖女。新塘大队王长桂有年交不起地主彭瑞隆的租，

彭瑞隆坐着四人大轿到他家里，冲着他爹说：“利生跛子，作我的田想不交租，好大的狗胆！没有谷，拿东西作抵。”喊一声“来人，给我搜！”把屋里的猪赶走了，罾子里的几升黄豆、几升米也刮去了，王长桂一家眼泪巴巴。三联大队王丙坤的父亲交不起租，逼得把他兄弟两个作一百四十块光洋卖掉了。

大地主胡海云依靠地租剥削，二十年间由四十石租滚到一千石租。佃他的田，租子重，押金高。他拿了租子和押金又买田出租，“拿农民的拳头打农民的嘴”。农民没有一个不恨他，都叫他做“如意算盘”。

佃不起田的，便帮地主做长工。做长工更苦，是卖“阳寿”。吃的冷饭冷菜，听的冷言冷语，走的侧门，住的杂屋。这里至今还流传着一首长工歌，控诉了那时候长工们受压迫、受剥削的苦楚。

正月长工是新年，手拿白纸定工钱，长工要钱五吊五，  
老板只出两吊钱，忍气吞声做一年。

二月长工倒春寒，脱衣扎裤把毡翻，冷水浸得骨头疼，  
一身冻得战慄慄，长工莫想进火房。

三月长工下了田，箢箕扁担不离肩，脚跟冻成莧菜梗，  
身上冒得好衣穿，长工难做实可怜。

四月长工插田忙，鷄啼狗咬就起床，甕中打了三个轉，  
走得回来冒天光，老板还說咁早床。

五月长工是端阳，长工歇气看爹娘，爹是天来娘是地，  
长工不是人养的，想起长工流眼泪。

六月长工見了新，老板杀猪百多斤，上头桌上紅燒肉，  
下头桌上一碗葱，骨头骨脑哄长工。

七月长工七月中，炎天暑热象蒸籠，中时要挑三担草，  
夜里堆草汗淋淋，长工哪有歇凉工！

八月长工中秋节，老板丰收来賞月，月儿圓圓月儿缺，  
长工还是单身客，想个堂客不易得。

九月长工是重阳，犁田种菜日夜忙，高粱豆子到处有，  
老板吃的嘖嘖香，长工哪能把味尝！

十月长工正立冬，喂猪磨糟到三更，天亮要把饭搞熟，  
晚上要把米来舂，百般苦楚磨长工。

冬月长工大雪天，长工伤风倒床边，老板连连发混气，  
为何一病两三天！长工比狗不值钱。

腊月长工要过年，哀求老板付工钱，算盘打得嘩嘩响，  
三除两扣倒欠钱，一年辛苦又归原。

象这样给地主做长工，不少的人做了一世，从  
细时候放牛一直做到老。细伢子放牛，苦处更多，  
地主这样说：“猫无夜饭，狗无中饭，放牛伢子冒早  
饭。”地主把看牛伢子看得和猫、狗一样。

高利贷的剥削，是农民头上的另一把刀。

穷人借高利贷，是挖肉补疮。东林大队夏瑞  
芳，父亲死时借了地主一副棺材，只值十五石谷，  
地主逼他还了一条小牛，做了三年长工。在这三  
年中，他帮地主拖树，地主竟得了六百石谷。官塘  
大队地主胡少华，七头猪、十石谷起本，放债十一  
年，除了全家大吃大喝，还有四百石谷放债，买了  
二十亩田，起了七间房子，家里还存一百多石谷，  
两百块光洋。

## 帝国主义的血债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两次侵占春华山。一九四三年在这里扎过一年多，欠下我们一笔大血债。

日本鬼子烧杀奸淫，无所不为。官塘大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杀死的就有一十八人，光春华山街上八月初一炸死的居民就有七个，大兴大队被鬼子强奸的妇女有二十八人。官塘大队的胡树林，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被鬼子拉去抬轿子。鬼子象个肥猪，他抬不动，跌了一交。鬼子恼羞成怒，在他身上浇上洋油，活活地把他烧死了。

有气节的中国人，是不甘受侮辱的。兴龙大队王子禾的堂客被鬼子逼得没有办法，抱着小孩跳塘自杀了。王子禾气得要找鬼子拚命。发元大队雷家大屋在鬼子去抢劫时，被青年人打伤两个，吓跑两个。以后鬼子就再不敢到那里去了。

## 水旱灾害連年不断

解放前，浏阳河是个大祸。那时流传：“浏阳河里一个鬼，三天麻雨发大水；浏阳河里一个神，晴得三天旱死人。”沿河一带的田，一年要旱二十多

天的水，若是天旱年成，插秧上岸，水車就要日夜转。

壬午年(一九四二年)，五月十八发头河大水，七月初三发二河大水，洪水来势凶猛，现在春华、九如、大明、东林、官塘、高峯、新塘刘家园一带都是汪洋一片。大明大队二十一个屋场被冲得只剩下两间房。这一年，田里只收得三成，好多人都从此破产了。现在春华大队的石甫生、石双全等八户，就流落外乡讨米、做长工，一直到解放后才回来。地主、资本家却趁火打劫，发灾荒财。春华山街上粉铺老板在荒年做蚕豆生意，赚了好多钱。王寿西挨地四个布(值八石谷)起本，放高利贷，这一年连本带利就滚到二十四石谷。

一九四六年又遭天旱。天旱只有车水。可是塘里的水是人家的，打河车又要人工，哪里车得起！眼巴巴的看着禾苗被干死，当时好多人都急得哭。

## 官 匪 横 行

国民党、土匪是替封建地主保镖的。乡长、保长本人就是地主，或是地主的狗腿子。县政府、乡公所、保办事处是地主的“本家”，是穷人的死对头，苛捐杂税、抽丁派款，弄得人人切齿，个个痛

恨。大兴大队石庚全为躲壮丁立“活人碑”，~~为躲壮丁~~为躲壮丁设假灵牌，潘八爹养个儿子，怕躲壮丁，以男报女。石塘大队雷向成四兄弟，三年中了三个壮丁签，送礼请客花了不少冤枉钱，还是逼得弟弟离乡别井，一直杳无音信。

那时土匪多如牛毛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，这里有十三部它子军：张部、毕部、刘部等等。它子军是官又是匪。见人就捉，见东西就抢，真是作恶多端。人们是这样骂他们的：

它子军过路身，十里路上草不生；

它子军跌个弯，家家户户一扫光。

一九四五年闹得最凶，田里冒得人敢做工夫。有水干死田。王寿全踩田踩了一半，碰着张部拉伕，他就跑，它子军就追着打，逼得他躲到沅江去了。那半边田始终没有踩完。

“圈子会”也凶得很。圈子会头子称王称霸，坑害人民。

胡松云是圈子会的虎威大爷，霸占了胡华松的堂客，逼得胡华松跑了湖北。胡汉湘只说了一句，“胡松云也太不应该了。”胡松云就密令圈子会的人深更半夜将胡汉湘抓到大鱼塘九龙山上，先割了鼻子，再挖掉眼睛，砍掉两手，斩去下身，把尸

首绑上石头丢在井里。

那时节，真是个昏天黑地的鬼世界。

## 春华有光荣的革命历史

贫农、下中农受不了统治阶级的剥削、压迫，总想革命。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搞了一场。

那时叫办农民协会，起蒂的是共产党员罗建山，朱少希、胡石泉。他们在新塘坵成立了党支部，发展了一百多个党员。一九二六年四月，成立了春华山农民协会。东至龙王庙，西至望仙桥，包括现在黄花公社和谷塘公社一些地方，农民协会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打击了土豪劣绅和封建势力。

过去大家怕土豪劣绅，兴了农民协会，大家就不怕了，遇到那些不守法的，还要提到农民协会审问，罚他们游团。游过团的有杜少墨、张鼎太，潘真孚、胡寿生等二十多人。高乔坪团总粟甫成，原先神气得很。农民协会去捉他，吓得他躲在猪粪池里，捉出来一身都是屎。土豪劣绅再冒得神气了。

农民协会禁止歪风邪气，赌钱打牌都禁住了。

农民协会还办了合作社。合作社设在春华山街上，资本家一斤盐要卖百把个钱（铜元），合作社

只卖六十个钱。

农民协会还组织了纠察队，有一千多枝梭镖，漆得红通通的。队员穿的青衣青裤，打的青裹腿，戴的大斗篷，威风凛凛，地主恶霸好远看见了，就吓得战战兢兢。

农民协会搞了十四个月，一九二七年五月，反革命叛乱，罗建山被杀害了。农民协会的其他领导人有的牺牲了，有的转移出去了。革命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永远记得这件事。从这时候开始，我们知道要翻身就只有跟着共产党搞革命。我们坚决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，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

## 出了苦海 得到翻身

一九四九年春华山解放了，我们翻身了，红旗又树起来了。

一九五〇年春，人民政府派干部领导我们减租反霸，成立了农会，进行了反霸斗争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，春华山开始土地改革。土改干部下来访贫问苦，扎根串连，全社扎的根子共有五百三十二个，象现在的社、队干部胡华鸿、曹德华、朱子干、王松柏、胡龙生都是这一批扎下的根

子。那时，我们贫农斗地主最坚决，民兵夜夜放岗哨。王松柏巡夜走到实竹垅，跌得一身水湿，顾不得回去换衣，烧个稻草烤一下又起身。他带头到地主家里没收财产，地主王沛林把九百块光洋埋在牛栏里，大家都不晓得，就是王松柏发动了贫农，把钱取了出来的。有的地主逃到外面去了，民兵就积极去抓。新塘南屋嘴的地主“彭五老爷”远逃到南县，也被民兵抓了回来。

地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，千方百计地进行抵抗。一九五〇年初，石塘铺的地主王蕪松，就搞假农会，拖起菜刀要杀工作干部。土改时，我们贫农起来了，假农会取消了，有的地主又企图用小恩小惠、用美人计来腐蚀我们，有的顽固抵抗，死不认罪。栗山大队地主胡顺成，拿两把剪刀插在田里，想刺伤农民。杜意芳土改前早就把田契照抄了一份藏在屋簷下，土改中谁分了他的田，他都记上账，只等以后“变天”。

斗争地主搞得热火朝天。石塘斗王新塘，发元斗胡耕年，都开了千多人的大会。上台控诉王新塘罪恶的有百把人。王新塘七兄弟都是恶霸头子，叫“王氏活雷公”。土改中，镇压了四个。农民伸了冤，报了仇。

土地改革中，贫农、下中农得到大批胜利果实。那时高峰、大兴一带，平均每人分田一亩四，荷林一带分田一亩八，石塘一带分田二亩。农民得到近两万亩土地，还分得了其他好多物资。石塘乡老贫农胡德福三代讨米，没有屋住，分了瓦屋；没有口粮，分了十多石谷；没有棉衣，分了棉衣。他儿子结婚还分了一房家具。真正翻了身。

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，春华乡建立了党支部。在土改运动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## 走社会主义道路

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阶级，绝大部分农民生活上升了。但那时贫农家底薄，生产生活还有困难，遇到天灾病疼，还是要欠债破产。到一九五三年，官塘大队就有七户人家卖土地，卖房屋。复元大队贫农李东海，亏了账，过不得荒月，卖掉了九亩青苗。这些事，当时乡政府都帮助解决了，但是怎么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呢？

这时，党和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号召：组织起来，互助合作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。

我们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。一九五二年，高山

的石孟其，就第一个带头搞互助组。开头入组的只有石朝双等三户贫农。他们有三缺：缺耕牛、缺农具、缺粮食。组织起来以后，用集体的力量，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。他们分工合作，抽出人到外面挑脚，筹集了一大批资金。周围的贫农看见他们办得好，也要求入组，互助组很快发展到七户、九户、十二户。当时中农祖全昌讽刺他们：“穷光蛋搞互助，累死也是空的！”他们憋了气，下了个决心：“我们就搞个样子给他们看！”互助组与单干户暗暗比起赛来。国家也给了互助组大力支持，贷给了他们三百五十元，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。大干一年，互助组的粮食产量由每亩三百三十斤增加到四百八十斤，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，县里奖给了他们耕牛、农具，大家劲头更大了。

一面红旗树起来，大家也就跟着搞。现在的春华山公社范围内很快就成立了二十二个互助组。

一九五三年底，石孟其互助组转了初级社。这一年，他们干了一桩有名的大事：改造了“四十八丘”。“四十八丘”是一片零碎的低产田，所谓“四十八丘一亩半，蓑衣盖过两丘半，人下田，牛上塍”。他们挑客土掺本土，改小丘成大丘，一年增产一倍。一九五四年这个初级社共增产二万二千六百

斤，每个社员分粮达七百斤。

这一年开始种双季稻。单干农民力量单薄，怕失败，不敢种；合作社力量大，积极带头种。有些人泼冷水，说：“种‘双季稻’是‘双脚跳’！”“‘南特号’是‘难得搞’！”初级社去捉虫，他们又说：“作田好经验，早晨去跟禾打扇；作田好办法，只怕冒饭呷（吃）；捉虫要打锣，一天捉得箩数箩。”他们没有信这一套，坚持进行了试验。结果双季稻丰了产，比单季稻每亩高一、两百斤，泼冷水的人不做声了，双季稻开始推广了。

一九五五年，在石孟其办的初级社的带动下，春华山一共办了十三个初级社。

一九五五年，初级社都大增产。大兴初级社二十四户，这一年，稻谷丰收，红薯、马铃薯堆起来分不完，吃不了。

一九五五年秋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春华山实现了初级合作化，一共办了五十九个初级社，全乡百分之八十的户入了社。那时候，群众积极要求入社，春华山的联盟社头晚宣布扩社，第二天全乡一百一十五户就送来一百一十五张申请。

一九五六年建成了高级社，五十九个初级社并成三十一个高级社，百分之九十六的户都组织

起来了。这一年，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

搞互助合作，靠贫农、下中农积极带头，贫农、下中农不扎紧把子就搞不好。比如，一九五五年，武塘农业社贫农没有树立优势，中农想留后路，生产搞得不好。中农的猪牛多，肥料折价定得高，中农要自己喂牛，喂牛工分也定得高，事事搞得贫农吃亏。后来省委派来工作组，帮助进行了整顿，发动贫农、下中农当家做主。贫农、下中农在社委会中占了优势，贯彻了互利政策，搞好了和中农的团结，合作社巩固了，生产搞好了。毛主席表扬了这种做法，告诉我们一定要树立贫农、下中农的优势。

互助合作运动中，一直有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。大多数人逐步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，但是，少数上中农总留恋资本主义道路。有的卖了耕牛入社，有的入了社以后一遇风吹草动就闹退社。高山大队的中农李少林，同我们唱“对台戏”，曾经九次闹退社。特别是一九五七年，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，地富分子也乘机起哄。武塘大队的胡玉章是个伪保队副，不出工，闹退社，要打干部。我们贫农和他辩论了一场，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，政府依法判处了他的徒刑。

农业社是在斗争中发展的，也是在斗争中巩

固的。依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，一九五七年战胜了天旱，全社粮食产量达到了一千二百万斤，比单干的时候大大增产了。

## 人民公社 光芒万丈

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，春华山成立了人民公社。这是我们的一件大喜事。建社那天，大家都敲锣打鼓，兴高采烈。公社人多力量大，我们春华山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发发展了。拿全社的水利建设来说，一九五八年修起了跃进水库，和中苏友好公社共同修起了红旗水库，又和果园公社共同修起了金江水库。这三个水库灌得本公社二千多亩田。过去青山的大湖，动車就車干了，天干要五梯車从坝上車水，早就想要修水库，只是社小力量小，解决不了。公社化后，就决定修跃进水库，大家劲头大得很。这座水库没有要国家投资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修成的。为了搞社会主义，那时我们不怕冷，不怕苦，五、六十岁的老馆子曹永康、李建恒、王永华都争着到工地上挑土。贫农陈海云病了也不肯离开工地。

一九五九年又修了瓢塘水库。这个水库容水一百七十万立方米，可灌田三千亩。不是公社化，

根本搞不起来。回想搞单干时修一口水塘都很不容易，互助组也搞不起大建设。一九五二年，新塘修了一个三岔塘，灌田不到三百亩，当时觉得很了不起。现在看来，真是不算一回事了！很多人说：“不是三岔塘小了，而是我们农民组织起来力量大了，眼界大了！”正是：“互助组是盏灯，初级社一颗星，高级社象月亮，人民公社象太阳。”

一九五九年、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，遇到了好多年未见的大旱，但是由于公社修了这几座大水库，再加上合作化时期修的许多小水库，因此大大地减轻了干旱的损失。

一九六三年，我们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。八月初，正是大旱的时候，一气安装了五台电动抽水机。冬里又安装了八台电动抽水机，有了这十三台机器抽水，全社百分之八十的田可以电动排灌。我们还大力兴修了渠道。很多渠道从山腰开过，兴龙的渠道，围山十里，山冲田也能得到灌溉。加上那三个水库的水，全部田亩可以水旱无忧了。从一九六三年起，全社大搞造林。武塘、大兴、青山垦了梯田，栽了果苗，种了树木。九如大队沿河栽柳，洲上种桑。我们打算两三年消灭荒山。现在，我们正在搞水利化、机械化、电气化的长远规划。这些建设，

比起前几年修水库又大不相同了，力量更大了，眼界更宽了。我们农民有共产党领导，有工业的支援，靠集体的力量，腰杆子越来越硬，能办的事越来越多了。只要我们发狠生产，眼看就可以把社会主义的春华山建设得更好。

## 新旧社会两重天

到今天，我们社员的情况和过去相比，真是将天比地，一在天上，一在地下。

一九六三年底，九如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作了几个比较：

政治上，过去当牛当马，讨米的三十五人，当长工的三十一人，当女工的十一人，做童养媳的四十三人，卖崽送女的四人；现在当家作主，当国家干部的十六人，当大队、生产队干部的四十四人，当教员的三人，在国家企业当职工的十二人，在农村的党团员三十一人。

生活上，过去欠债借高利贷的四十八户，全家冒棉衣的五户，家里有人冒棉衣的四十四户；现在，全大队人人有棉衣，还有一半的人有卫生衣、毛线衣。平均每户有两双胶鞋，每户有洋瓷脸盆，每两户有个热水瓶。

文化上，过去成年人一多半是文盲；现在有在校小学生七十八人，中学生十三人，大学生六人，平均每戶有一点二支钢笔。

过去人们怕灾荒、怕病疼、怕老了受苦；现在生活有了保障。壬午年发大水，逃荒、讨米，富人还要在穷人脑壳上踩一脚。一九五四年的水比壬午年还大三尺。一涨水，县里、区里就派干部驾起船来救人。当天晚上，灾民都安置在仓库里吃饭。第二天就统销粮食，就发救济。老春华乡一共救济了三千多斤粮，一千多块钱，十多床棉被，五十件衣，九十件卫生衣。政府大力领导生产救灾，一九五五年就得到丰收。

这几个对比说明什么？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好得很！说明旧社会是劳动人民的地狱，新社会是劳动人民的天堂！

### 永远記住党和毛主席的話

党和毛主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，还存在着阶级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，我们一定要記在心里。这几年，有些人阶级观点淡薄了，说：出工一路行，收入按劳分，开会同志们。不記得还要分清敌我，不知不觉上了敌人的当。阶级敌人是不死心

的。四类分子在我们的管制下，有的比较守法，愿意改造成成为新人。但有的—直抗拒改造，妄想变天。我们稍—管得不紧，他们就搞破坏。武塘大队地主分子胡光泉，把毒草当甘草给贫农的儿子吃，九如大队地主分子曹庆华婆娘给支部书记泡茶，—碗茶里放了二十四个芝麻钉子。高峰大队的地主分子王海其，给所有的大队干部都送过礼。桂花大队的地主分子章长树，猖狂地动手打干部。阶级敌人有种种手段，种种花样，我们要百倍警惕！我们还要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。要爱国家爱集体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—心—意搞好集体经济。

总之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要永远记住：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，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，不可忘记依靠贫农、下中农，不可忘记党的政策，不可忘记党的工作。这是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真理。

## 子子孙孙跟党走

大兴大队泉塘生产队队长 栗成武  
栗春慈

我们两兄弟在旧社会过了三十多年牛马不如的生活。两个人做了十多年长工，到头还是一无所有。那时候，做长工早上烧火扫灶，晚上喂猪磨糟，住的侧屋，走的侧门，吃的残菜剩饭，听的冷言冷语。地主富农不把我们穷人放在眼角里。栗春慈在富农田桂云家里做长工，过端午节家里没有米，要他预支一升米都不肯，最后借了两斤荞麦过节。有一年多用了几个回头工，扣去了一箩谷，搞得我们一家人哭了几天。为了不受这个气，栗春慈就辞工不做，跑到城里去挑河水卖。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别的人都往家里走，栗春慈带着堂客和华伢子却往外头走。临走时，病在床上的母亲说：“你们挣点钱，早些回来。”可怜走的那天，大风大雨，身上冷犹自可，心里真不是味。挑一担水桶，一头挑着华伢子，一头冒得东西放，放几块劈柴。哪知出门不几天，娘就病死了。听到信后，又赶紧挑着一担

水桶回来，还是一头挑伢子，一头挑几块硬柴，下午动身，路上又是大风大雨，冒得钱买伞，别人施了一把烂伞，只有半边，遮得伢子，冒遮得大人，遮得前头，冒遮得后头，打得一身透湿。走到晚上，在人家屋里借了歇，第二天饭都冒吃赶回来。那时身无分文，家无粒米，一家人哭哭啼啼，好不凄惨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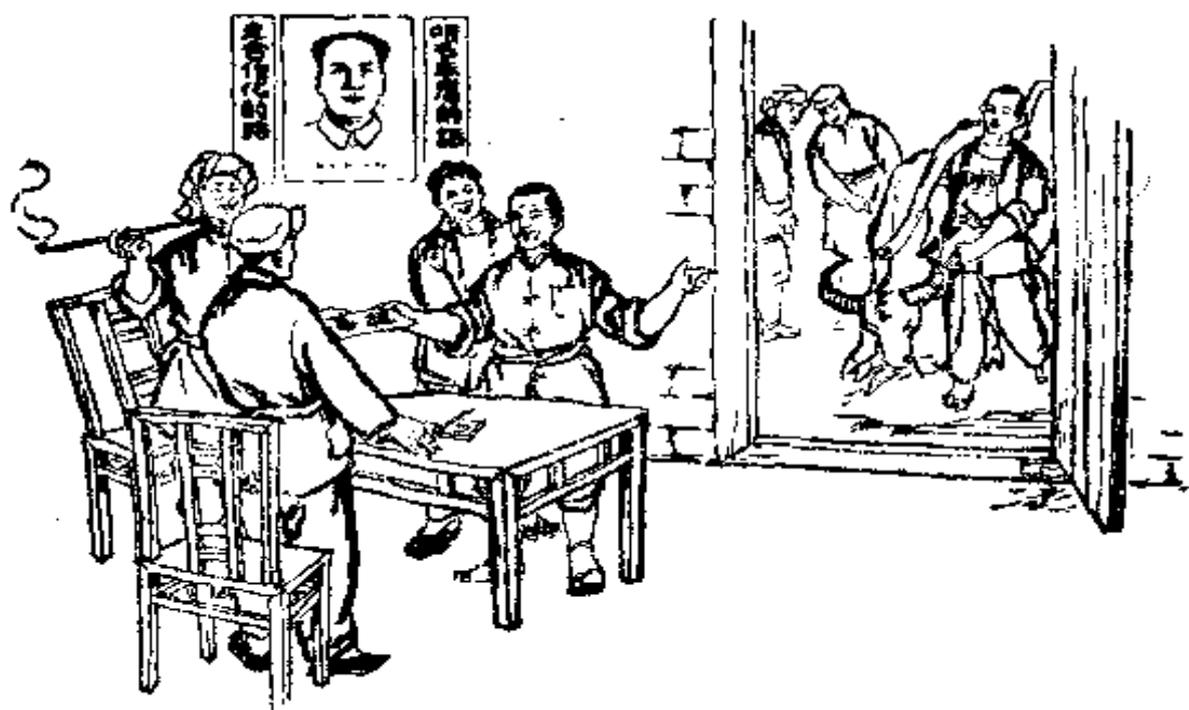
人穷犹自可，还要受种种压迫。乡丁、保丁天天来抓壮丁，搞得粟成武归不得屋，躲过了日里，躲不过夜里。头一次来捉人，邻舍把信，逃脱了。第二次，粟成武在油榨房里做工，搞了五晚没睡觉，加上心里着急，怕自己被抓去，家里人活不了命，只有几天就瘦得不象人样了。谁知一声喊，乡丁闯进来，不由分说就把粟成武抓到乡公所去了。在乡公所，验壮丁的看到粟成武瘦成那个样子，就把乡丁骂了一顿：“这副死样子也抓来充数！”把粟成武放回来了。但我们怕以后还来抓人，日夜提心吊胆。这时，粟树根的父亲死了，邻舍来献了个计，说：“何不说是粟成武死了？”我们被逼得冒办法，只好依了这个计策，假称是粟成武死了。抬起棺材走春华山街上过，要侄儿粟树根捧着粟成武的灵牌，把真灵牌放在腰篮里。在旧社会，真是没有我们贫农、下中农的活路啊！

伪乡长、保长以为粟成武真的死了，间了几年没有来抓壮丁。后来，乡公所狗腿子告了密，乡丁保丁又来抓人了。粟成武怕这一次躲不掉，就逃到江西去了。在江西不服水土，得了瘧疾病，回来后病了两年多，东挪西借才把病诊好，过了两三年才把賬还清。

后来，两兄弟都在公路上做零工，也是吃不饱肚子。有一回，腊月二十八下工，走到家里已经断黑了，屋里伢妹細仔还冒得夜饭米。公路上支的工錢早已买米吃了。第二天就是除夕，别人高高兴兴过年，我们悽悽惨惨受餓。

这些苦，我们一辈子都記在心里。共产党来了，我们贫农才翻了身。水有源，树有根，我们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够翻身。所以我们两兄弟遇事总是响应党的号召，一心跟毛主席走。土地改革后，我们带头组织互助组。一九五四年我们带着耕牛、农具第一个加入初级社。我们的一头牛，别人出九十块钱来买，我们不卖，做七十块钱折价到社里。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，我们一心为集体。队上缺水車叶子，没有木料做，我们把自己的好树交给了队上。一九六三年，队上要修农具，没有杂木，我们立即把楼枕拿出

来。我们年年出工投肥，都超额完成任务。早一向，队上新办油榨坊，缺少资金，我们又卖了一头大肥猪投资凑本钱。解放十多年来，我们处处为国家、为集体着想，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，没有半点



摇摆。我们全家先后被评过十八次模范，《新湖南报》还表扬粟成武是“贫农的榜样”。一九六四年，粟成武还参加了省里的贫农、下中农代表会。我们永远记得，在旧社会，我们穷人的肩膀给富人当路走，眼泪只好往肚里落。在新社会，我们才能当家作主人。今后，要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，保持光荣，发扬光荣，站稳无产阶级立场，并且教育子孙，永远跟着党走。

## 我要留着討米袋

东林大队貧农 余桂娣

我討了十多年米，一家人用了三个討米袋。这三个袋子，我总舍不得丢掉。有一个袋子，我孙子装抽水机零件拿到浏阳去了。还有两个，我檢在柜子里，隔不好久就要拿出来看一看。

我是被逼得冒办法才討米的。

我二十二岁嫁到余家。那时，住在木馬墩刘家公屋万宝宫。家里很穷，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老倌余桂易拖东洋車、抬流轿子，吃尽苦头，全家六个人还是餓不了口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丢下自己的細伢子，到外边去喂奶子。头一次把刚生下八个月的荷伢子寄在隔壁刘家，到黄花市姓王的大官僚家里去当奶媽。自己的孩子丢在别人家里，怎么不想啊！搞了三个月，我霸王请假回家看他。可怜天哪！哪晓得我的荷伢子头天已经死掉了！刘家自己的伢妹子多，怕荷伢子屙尿在床上，总是搞个灰袋接尿，那天是他七八岁的伢子装灰袋，伢子不懂事，

袋里装的“红灰”，荷伢子就这样被烧死了！他死得好惨！我摸着荷伢子烧得焦黑的肚皮，心如刀绞。这又有么子办法呢？王家的奶妈也没有当下去了。过了两年，生活还是很困难。那时节，我又有个月十个月的昭妹子，就把她送把黄花市一家姓柳的人家，说定长大了给他做媳妇，我自己又到南溪塘姓李的地主家里喂奶。后来，我的昭妹子也磨死了！不晓得是么子病，死的时候口里、鼻里、眼里到处爬出一条条的虫来，也是好惨的。“喂奶子，喂奶子，看着亲生遭惨死，养活地主的龟孙子！”想起那个鬼世界我就恨！我一共生了十五胎，送的送人，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，烧的烧死，……真正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。

辛巳年，叔爹死了，他遗下三亩田、一亩土、两间屋，我老信承继了这些东西。心想这下不再受穷了，可以兴家了。谁知嫖娼、老信接连去世，几亩田地卖了个光。第二年是壬午年，又发大水，我一家人走投无路，只好拿起讨米棍，背着讨米袋到浏阳去讨米。在那个鬼世界里，财主佬把“叫化子”看得比狗都不如。有一回，在浏阳姓张的地主家讨米，我只把脚在门槛上放了一下，他就是一顿臭骂。骂我“败”了他的“家运”，连推带打把我们赶出了

朝門。还有一回，在彭家冲讨米，我走累了，在地主余寿山的竹椅上坐下歇一下气，地主婆把我从椅子上掀下来，说我的“叫化子气”沾坏了她的椅子。

这十多年多讨米的日子，不晓得撑断了几多讨米棍，走过了几多烂泥路，受了几多冻和饿，恹了几多冤枉气，这几个补丁迭补丁的讨米袋一直没有离开我。如今，我把它看做亲人一样。

土地改革以后，我家里分了十亩田、四间屋、一张大柜、一张床铺、一张书桌、十几石谷。大儿子余友桂当上村长，小孙子余海泉当了民兵，抓地主，斗地主，总是走在头里。到公社化，我屋里越发好了。满崽余忠桂当了抽水机手，大孙海泉当了团支部书记，二孙海训参了军，老三在家里种田，老四上了中学，大孙和二孙还加入了共产党。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七十五岁的老婆婆还能有今天。不过，老一辈不讲古，后生子不知苦。我的满崽余忠桂和大孙余海泉，好了疮疤忘了痛，几年来犯过一些多吃多占的错误。我把讨米袋拿出来，把过去受的苦楚讲给他们听，教训了他们一顿，他们才记起过去，悔不该忘了本，认识了自己的错误。我要把这件“宝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，让后人知道老一辈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
## 我是扶着討米棍长大的

九如大队貧农、下中农协会副主任 楊福全

解放那年我才十四岁，可是就已经讨过十二年了。想起过去受的许多苦，我就痛恨那个鬼社会。现在的青少年们根本想不到人世间有那样的痛苦生活。

我是黄花馬园人。一九三七年，我才一岁多，我父亲把眼睛疼瞎了，母亲就一手抱着我，一手牵着哥哥去讨米。那时我家还有两间烂茅屋，自己住一间，把一间佃给姓刘的穷人住。姓刘的靠抬轿为生。有一回，不知因为什么事得罪了一个伪军官，那个伪军官一把火把两间房子烧的精光，我家也遭了横祸。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母亲丢下我们走了，是死是活，没有消息。那时，我还只有两岁多，哥哥也还只有五岁。

每天，瞎子父亲抱着我，由我哥哥牵着四处讨米。可怜我们老少三个，无处归宿，睡露天，住破庙，就这样熬过了五年。父亲年纪老了，加上几年

来挨饿受冻，病倒了，我和哥哥只好把他牵到界背岭一个土地庙里找了一把草，把他扶在草上睡下。一连五天，粒米未沾，滴水未进。第六天早上，只见他没声没气地躺着，我们喊他，抱着他的头摇，他也不答应。可怜他不知什么时候丢下我们兄弟死了。我和哥哥伏在父亲身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“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”我们太细不懂事，整整三天三夜守着父亲的尸体，无法安葬。直到第四天早上，一个姓王的穷人来进香，我们兄弟跪着求他，他看着我们可怜，才找了几块木板把父亲埋葬了。

父亲死了，哥哥跟人学徒弟去了，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过。剩下我一个人，还是只好靠讨米为生。年纪小，走不动，经常一天到晚，一粒米也讨不着。饿苦了，就吃树皮草根，别人摔在塘里喂鱼的烂菜叶子，我也捡来吃。那时，睡的是破庙、屋檐下、草堆里、瓦窑里、或者大桥底下。夏天蚊子咬得满身是疮，烂得我不象人样。手肘上烂得露出了骨头，肚子上烂得好大一个眼。到了冬天，就更难熬了。身上只有烂布筋样的单衣，一条烂裤。我长到十二岁从来没有穿过鞋子，冬天也是一双赤脚。脚后跟总是烂得看见骨头。最难过的还是晚上，一个人住在破庙里，又冷又怕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捡

些枯树枝来烧火烤。有一回，我讨到一副烂棉套子，就把它捆在腿上，烧了一堆火，捲着身子睡着了。睡到半夜，我腿一伸，棉套子着了火。我只觉得腿上疼得厉害，醒来一看，才晓得棉套子燃了。解也解不开。等到解开一看，从膝盖骨到螺蛳骨，已经烧得起了泡，有的地方都烧焦了，疼得象万箭钻心。烂了一年多，直到现在还有尺把长、四五寸宽一个伤疤。我一摸到那个伤疤，就想起过去的辛酸。腿烧坏了，六个多月动不得，要不是四周的穷人可怜我，不时给我送点剩饭剩菜，我这条命早就没有了。

讨米最怕雨天，每逢下雨，没有伞，没有斗篷，就搞一把草顶在头上。一把草哪里能挡住风雨，总是被淋得透湿。冬天，从来没有洗过澡，满身是虱。那时，我瘦得皮包骨头，十来岁的孩子，长得又矮又小，想给人家放牛也不要。

我讨米，被狗咬是常事。从我晓得事的时候起，就被咬过二十多回。穷人家的狗咬着了，他们可怜我，给我倒茶倒水，洗得干干净净。最可恨的是地主家的狗。有一回，我讨到地主曹庆华家，刚走到他的晒坪里，一条大狗跑了出来。我被狗咬怕了，见了狗回身就跑，狗追了上来，十来岁

的小孩，哪里跑得动，一交摔在地上，狗在我的屁股上咬了一口，鲜血直流，我疼得爬起来乱跑，一下掉在他门前的大塘里，一身打得透湿，站都站不起来，曹家的人还看着发笑，我硬是恨死了他们。



地主的心最狠毒，到地主家讨米，不是挨骂就是挨打。有一回，我讨到地主陈世介家里，他家做寿，我想倒一点剩菜吃。哪晓得东西没讨到，反而挨了匪兵几枪托，打得我全身青紫。

十岁那年，四月间，我讨到地主周梅生家里，他看到要我这个叫化伢子放牛比请一个看牛伢子划得来些，就要我留在他家放牛。我想放牛比讨米总会好一些，谁知放牛也是活受罪！一人要喂两头

大水牛，牛沒有吃飽就不給飯我吃；打了他的牛，他就打我；除了放牛，每天還要打豬草，做很多別的事。六月間割了谷，每天挑草挑到深夜。到了十二月，事情少了，他也就不要我了，也不給工錢，拿起棍子就把我打了出來。

十二歲那年，討米討到祖家州，碰到兩個孤老人。他們見我可憐，就收留我做孫子，我才丟掉了討米棍。

一九四九年解放了，我才翻了身。土改時，我分得了田地，分了新房子。後來，我又成了家。現在兩位老人已經死去，我的女兒也有七歲了。一九六三年，三個人分了两千多斤糧食，欄里還有兩頭豬，真是不愁吃，不愁穿了！現在我又當了大隊貧農、下中農協會的副主任，這真是以前做夢也想不到的。我們貧農、下中農一定要翻身不忘本，一定要記得過去的苦，扎緊把子，把社办好，把生產搞好，永遠聽黨和毛主席的話，堅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。

# 一亩田

三联大队贫农 胡孟羊

解放前，我家里没有一个禾兜，全靠抬轿、打零工混日子。我八叔胡立成很小就瞎了眼睛，祖父把仅有的一亩田给了他。他一生就靠那亩田活命，称为“救命田”。后来，八叔由我家招扶，那亩田也就归我家种。那亩田靠近屋边，“祖遗的家产屋边的田”，穷得讨米也不肯卖的，我家祖宗三代就一直守着这亩田。

村里的地主胡杏初，家里有几百亩田，村边的一大片田都是他的。我家的那亩“救命田”，正好在他的田的中间。胡杏初早就望着那亩田呲牙了。这就好象狼口边放了一块肥肉，日夜叫人提心吊胆。

我十岁那年，八叔咽气了。他临死，对我父亲说：“那亩田是我家的命根子，胡杏初就是用金子堆了，也不能卖给他。”

八叔死了，我家无钱做道场，花了几石谷买了

一副棺材，就把他埋了。三天后，胡杏初怒气冲冲，跑到我家里，一进门就对我父亲吵着说：“稀胡子，你自己的兄弟死了，连道场都不做，你这不是有意丢我们胡家的脸！”我父亲说：“我家三天冒米下锅了，哪来的钱做道场！”“你不做我来帮你做！”胡杏初说完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胡杏初买了肉，请了道士，张罗着做了三天道场。没过几天，胡杏初来要钱了。他算盘一敲，说花了六十块光洋。天哪！我家哪里寻得出一文钱呢？胡杏初把眼一瞪：“我好意帮你垫了钱，你还想拖拖欠欠不还？还不起，我把你那亩田卖掉，你就到我那里去画押。”想起八叔临死的话，想到卖了田，一家人就没办法生活，我母亲死也不肯卖。胡杏初硬逼着以六十块光洋把田当了。写当契的那天，他干咳两声，鼻子里哼了几哼，说：“三年内不拿钱来赎，田就永远归别人了！”

胡杏初见田已到手，得意洋洋地对人说：“稀胡子吃饭人多，这一世赎回了田，我把名字倒写起！”这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，她气极了。“人争一口气”，我母亲从此每天上山砍柴卖，卖了钱，一个都舍不得用，父亲打零工付回的钱，一个也不花。有一回，我饿得直哭，要母亲拿钱去买米，她含着

眼泪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好伢子，听妈妈的话，积点钱把田赎回来就好了。”

第三年，六十块光洋凑足了。母亲满心欢喜，拿着钱去赎田。胡杏初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六担谷的息呢？不交息，田还是赎不回。”一瓢冷水泼到头上，我母亲手里的光洋滚到了地上。胡杏初眼珠一转，又骗我母亲说：“你女人家，不会买东西，把钱给我，我给你买几担便宜谷交息。”母亲不知是计，田也要他去赎，钱也给了他。谁知他拿了钱去，几个月冒音信，等到谷价由三块猛涨到九块时，胡杏初把钱退来了。眼看着六十块光洋化了水，母亲气得昏倒在地上。事后才明白，原来当田的就是胡杏初本人。就这样，胡杏初把我家的那亩田霸占了。

土改时，斗倒了地主胡杏初，我家分了六亩田，那亩田也回到了我们手里。为了这亩田，我家受了几多苦，吃了几多亏。我六十多岁的父亲，走到田边捧着泥土嗅了又嗅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你又回来了！”

合作化那年，我们高高兴兴把那亩田和其他五亩一起入了社。后来，又实现了公社化。如今，村前一大片，上百亩田都是我们生产队的，这些田归我们集体所有，产量一天天提高了。

# 卖身記

三联大队貧农、生产队长 王丙坤

## 逼 租

我父亲种的都是地主的田，母亲生过十一胎，家里人多冒饭吃，我出生还只几个月，就跟着母亲讨米。到八岁，我母亲去世了！

第二年，遇上大旱，租种地主的八亩田，干得颗粒无收。那年八月，地主胡寿庭、刘春生不管有收无收，上門来要租子。父亲说：“今年田里颗粒无收，您叫我拿什么交呢？”刘春生吼着说：“不交租就退田！”父亲怕退了田更难活命，急得连连讲好话。胡寿庭把贼眼珠朝我们兄弟瞟了一眼，狠狠地说：“这么多小崽子，养不活，不晓得卖他几个交租！”我吓得大哭，紧紧地抱住父亲的大腿不放。我父亲撫摸着，眼泪一滴一滴滚下来。父亲忍痛答应卖了我交租，地主才大搖大摆地走出門去。

## 被 卖

第二天，父亲以八十块光洋，把我卖给岭上屋“五殿閻王”王寅阶。这天，我家来了很多人，“五殿閻王”也来了。他们用大红纸写了一张卖身契，我父亲战抖着画了个押，就急得跌倒在地上，我哭着在地上打滚，死也不肯到“閻王”家里去。“五殿閻王”哄我说：“伢子，去吧！去了吃好的、穿好的，我不象你爸爸，养不活你。”最后，“五殿閻王”把我捉走了。卖我的八十块钱还是不够交租，地主又逼着我父亲把我一个弟弟卖了六十块光洋。

“五殿閻王”因膝下无儿，才把我买去的。第二年，“五殿閻王”自己生了一个崽，就不把我当人看待了，恨不得一口吞了我。当时，我正在读书，他就硬逼着我每



天砍三担柴。早晨砍了柴读书，中午放午学砍了柴才准吃饭，下午回来还要砍担柴。没过几天，他又不准我读书了，那时我才十岁，“五殿閻王”把我当长工使用。

只有十岁，在外面挖土、砍柴；在家里，挑水、扫地；晴天田里做事，雨天去捡狗粪。“五殿閻王”总不让我有一点闲空。这样受了两年折磨，有一天落雨，我捡了狗粪回来，身上直滴水。“五殿閻王”照例来看簸箕，见簸箕里狗粪不多，一边破口大骂：“化生子！我冒咯多空饭养你！”一边用竹条子狠狠朝我打来。可怜我身上被打得青一条、紫一条，痛得大哭。挨了打，“五殿閻王”还不准我吃饭，要我一个人睡在草棚里。

## 逃 走

当晚，我冒得饭吃，又冒得衣换，又冻又饿，越想越哭，想到我妈妈如果还在，决不会看着我受这等折磨，就大叫“妈妈！”可是喊天不应，呼地不灵。我忽然想起了正在地主家做长工的二哥友阶，隔这里只有两里路，爬起来就往那里跑。二哥见我全身湿透了，脸上刮瘦、惨白，抱着我痛哭。哭了好久，二哥才给我脱衣睡觉。看到我骨瘦如柴，全身

被虱子咬得稀烂，被折磨得不象人样了，两兄弟又大哭一场。二哥下决心要让我死里逃生。

第二天，二哥把我偷偷送到了浏阳樅塘富农刘作清家里看牛。

“五殿閻王”后来找我哥哥要人，见我冒在那里，才暂且放手。“五殿閻王”死了以后，我才回到家乡来，又当过两年学徒，八年长工，受尽了种种折磨。

## 翻 身

一九四九年解放，我才从苦海里爬到了岸边。土地改革不久，我成了家，立了业。如今，我有了四个伢妹仔，全家六口人，一九六三年分了三千二百多斤谷，我还当上了生产队长。旧社会的卖身崽成了新社会的干部。可惜那张卖身契走日本时丢掉了。不然，我要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，让后代都知道过去的苦，晓得今天的甜，更加热爱新社会。

## 三桩仇恨

三联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主任 王若明

我家祖祖辈辈种地主的田，住地主的屋，我这一世也受尽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。子子孙孙都要记得这些仇恨。这里，我只说三桩事。

### 一根竹子八席酒

我十岁那年，由庙背搬到雷家河墩里。只为去时没有请“入班酒”，雷家地主怀恨在心，把我家看做“外班人”。有一次，我父亲到雷家河人寿宫公屋山上砍了一根竹崽子系尿桶，雷家地主借端发作。他们上下勾结办了八桌酒，硬逼着我家出钱，还要赔“礼”认“错”。“富家一席酒，穷汉半年粮”，八席酒赔去了我家全年的粮食，搞得揭不开锅盖，只好把七岁的妹妹给人家做“童养媳”，吃奶的小妹妹也送了人家。从这时起，父亲就更加愁眉不展。

## 姑媽逼債不認亲

一家人硬是活不下去。作田，田是地主的，交不起租就不给你作；打零工，抬流轿，有人喊，就能混一天饭吃，没人喊，就只好喝西北风。我有个三姑媽，她是永安市的大地主。没有办法，向她借了六石谷，东挪西借凑了一些钱，佃了三十三石租的田。父亲一边种田，一边给姑媽做小工，媽媽进城喂奶，三个人舍死干，想把日子过好点。不料第二年，正当春耕的时候，父亲累病了。我人小，不晓得管事，只晓得发闷气。等我借得钱请来医生，父亲已快要落气了。我望着他眼睛散了光，眼泪双流。他看到我哭脸，就把我叫到床前，打起精神细声细气地对我说：“三伢子，苦命的崽呀！你要記得，你父亲是累死的，是餓死的，是逼死的！”只说完这几句话，他老人家闭上了眼睛去了，丢下了娘娘崽崽一家人。

父亲死了冒上山，老嫫也急死了。屋漏又遭连夜雨，我急得眼前一团黑，七求八拜，卖了十石新谷，才把他们埋了。这时，三姑媽闻讯赶来，她一进门就仰头大喊：“老兄喂！我晓得你会死，我冒早些来得啊！”喊了几句，就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三伢

子，你父亲借我六石谷，父欠子还！”这时我才明白：三姑媽不是来吊丧的，是来要賬的。我说：“我父亲、姨馳死了还下不得地，你就向我来要谷，我哪里有谷还？”她大声说：“冒得还，打票子下半年还！”我不肯打票子，她气冲冲地走了。

父亲上了山，姨馳入了土，弄得我欠了一身債。我只好天天喝菜汤、吃糠粑。踈田时节，人家回去吃中饭，我溜回家吞几碗冷茶，紧一紧裤腰带，餓着肚子又去做工夫。

好不容易盼到扮禾，可是扮桶一响，谷还在禾场上，三姑媽就来逼債了。我怕姑媽把堂屋里刚晒好的两石谷挑走，就背着姑媽溜进堂屋里急急忙忙推起来。谁知姑媽寻到堂屋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叫人把这两石吃饭谷搶走了。过了四、五天，三姑媽又帶人来了，进门不吭声就要把我堂屋里的一堆毛谷挑走。我说：“三姑媽，这大堆毛谷，一沒晒，二沒车，你说它有多少？”“哼！有多少，还我的賬还嫌少哩！”三姑媽指手划脚，又把几石谷搶走了。

姑媽才煎了油去，田老板又来要渣了，真是前面去了老虎，后門窜进豺狼。可怜我剩谷不多，交不滿租。媽媽央求老板说：“看在我伢子面上，明年冒饭吃怎么作田？请老板高抬贵手，留下一点点。”

可是老板哪里肯留，连声喊：“送！送！一粒也少不得。这样的瘦猴子，冒饭吃还作得田！想要我的田栽栗树，晒月亮！”

作不了田，屋也住不成，我们只好扫仓倒桶交清了租。“禾镰子上壁，冒得饭吃”，餐餐吃的是红薯粥，萝卜菜。

### 恶霸地主毁茅棚

壬午年遭大水，佃的房子被冲倒了。幸好我捡了几根烂木头，想在原来的地基上搭个茅棚。可是万恶的地主嫌我穷，不许我在那里安生。我搭茅棚的时候，他带领伪兵横枪竖刀毁掉我的木架，割断我的绳索。我一再央求，他也不肯。母亲气坏了，冲着地主说：“老爷！难道要我们打伞作田！”狠心的地主一脚把我母亲踢开，说：“就是要你们打伞作田又怎样？”我有苦无处诉，既没屋住，又无田作。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可怜我二十几岁的后生，一身牛力，连个母亲都养不活。没办法，母亲只得改嫁了。

母亲去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抱着一床破棉絮，守着一口小耳锅。俗话说：“老鼠还有隔日粮，麻雀也有安身处。”在旧社会，穷人子连老鼠、麻雀都不

如。我含悲忍泪，走投无路，只好出去做长工。

我永远忘不了这三桩仇恨，忘不了那个人吃人的鬼世界。我要告诉子孙：地主是最狠心的，哪怕是姑妈，她也只顾自己发财，不管你穷亲戚的死活！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到了解放。在党的培养下，我入了党，现在当了大队支部副书记，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主任，当家做了主。生活上好比矮子上楼梯，步步高升，越过越好。回忆过去的苦，想想今天的甜，我觉得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我的亲人！我誓死跟着党走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！

## 不忘做长工的苦处

大兴大队贫农、生产队长 龙建武

我从八岁起，到一九四九年解放，做了十九年长工。

解放前，我家屋无片瓦，田无升合。我爹在安仁县一个煤矿当工人，赚的钱很少，养不活一家老小。我六七岁就开始讨米，过年送财神。屋里我爷爷（祖父）我娘和四个弟弟，时常打饿肚。在旧社会里，穷人的命不值钱，我爷爷生病没有钱诊，拖死了。他死了还没有埋，一个弟弟又得急症死了。第二年，我另外两个弟弟出痘子，没钱请医生，只两天就都死了。一九四五年，我娘也病死了。一家九口，只救得我爹、弟弟和我三口。

做长工是卖阳寿。我八岁帮舅舅看牛，只混碗饭吃，没有工钱，看两条大水牛，拉也拉不动，时常拖起我跌在地上。每天刈的牛草还要经舅舅看过，不然，他就说你懒。我累得要死，他还说，只有在他这里才能混到饭吃，别处还吃不到饭。这话，我一

世都記得。

地主富农根本不把长工当人看待，没有一个地主对长工不刻薄。事情要你做得多，工钱要你拿得少，想方设法盘剥你。我十几岁在宋家嘴姓彭的富农家做事，我没成年，他三十多岁。一上工，就要我跟他挑一样重的担子，要我塞筒车坝板，要我砬谷，硬把我当一个大成人来用。有一回，他家的砬板子已经坏了，我一上手就断了。他硬逼着我赔。其实，他堂客也晓得不是我搞烂的。我赌气辞工，他就扣着不给工钱。

有一年，在寿星坡地主龙瑞欽家里做长工，正月里的一天，他要我们两个长工送猪到麻林桥去，八十里路要一天回来。正是大风大雨，一出門就把棉衣打湿了。我们怕赶不回来，放肆赶路，弄得满身大汗。外面的衣衫雨水落湿了，里面的衣衫汗水浸湿了，身上沒有一根干紗。走到麻林桥，又碰上国民党部队擄伙，我们不敢走，到第二天一早才回来。一进門，龙瑞欽就把我们罵个死。

那年春上落大雪，他要我去寻猪菜。菜都被雪封住了。我扒开雪扯菜，手指冻木了，放在嘴边呵口气，不想龙瑞欽的儿子站在門口看見了。龙瑞欽罵我不该伸直腰来呵气，说我偷懶。我气极了，心

想，你们在家里烤火，手笼在袖子里，当然不冷。我的手冻木了，呵口气都不行。回嘴说：“又不是屋里死了人，呵口气的功夫都不准。”他怪我正月里骂他死人，结果只做十二天，就把工退了。当时，他还不肯把这十二天的工钱给我。

以后，我又到了地主龙瑞南家里做长工。他每天交代你做很多事，他的堂客也交代你做很多事。两边的事都要做，得罪了地主，他要辞工，得罪了地主婆，饭碗也保不住。插田收尾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小丘了，来了理发师傅喊剃头，我先剃了个头，再去插完田。龙瑞南见了大骂，说我不该丢了工夫去剃头。你们看，穷人连剃个头都不行。

当长工受的气，说也说不尽。睡的是杂屋、牛栏，吃的是残菜剩饭。吃饭不能和地主一桌，即便有时在一桌吃饭，好菜摆在地主面前，也不能动筷子。在龙瑞欽家里做长工，他每餐吃巴掌大一块的肉，从不喊你吃一点。那时依得我的脾气，要掀翻他的桌子。回头一想，没有工做，回去没有饭吃，也就只好忍气吞声。

解放前，我佃屋住，搬过六次家，最后屋也佃不到了，只好住在大兴山破庙里，与泥菩萨做伴。

解放了，我才翻身，土地改革分了田和房屋，结了婚，生活上升了。我小的时候不知道学堂是个什么样子，现在我的两个小孩都在读书。不是新社会，这些都是做不到的。土地改革时，我就当民兵，当民兵班长，高级社、人民公社，我一直当生产队长。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生产队办得更好。

## 一副棺材 三年劳役

东林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副主任 夏瑞芳

解放前，我家穷得锅底朝天。父亲夏玉成靠租种地主几亩田为生。累了一世，得了痲病。穷人子连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钱治病？就只好眼看着他一天天拖死。

那时，我在外面做零工，父亲死了大半天才把我叫回来。想起我父亲受的苦，禁不住伏在他身上嚎啕大哭。他没有棺材埋，我只得揩干眼泪，去哀求姑父胡菊生。胡菊生是桐子园的地主，经常放高利贷，是个有名的害人精。他见我找他，起了坏主意，假装好人地满口答应。他的儿子胡子桂在旁忙说：“既然是舅父死了，我做外甥的理应帮忙，我这里有一副上好棺材，你抬去，钱不要紧，以后再说！”我不知是计，只当他真是好意，当时说定一副棺材，十五石谷，秋后还清。

谁知父亲刚上山，胡子桂就来要债了。我说：“表哥，那天不是说定秋后还吗？”“胡说，要是别

人，先拿了谷，才能抬棺材。我好意把棺材借把你，你莫不知好歹。”他逼着要钱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屋里百无一有，只有我父亲累一世才买下来的一头小牛。牛是作田人的命根子，准备明年开春，用来给人家包田犁的。人死了，牛也救不住。我只得把眼泪往肚里吞，忍痛把小牛抵了债。那头小牛，至少卖得六石谷，可是，冒良心的胡子桂，好歹只肯算三石谷。我只能“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”。

过了三天，胡子桂又上门来逼债了。我再没有东西抵债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得要求以工抵债，到他屋里做长工。胡子桂做树生意正缺工人，一到胡家，就要我去浏阳拖树。这时我才晓得：上了胡子桂的圈套。胡子桂要做大树生意，干这种苦差使冒人肯去，就趁人之危，把我缠住了。

拖树是一桩苦工夫。冬天，天上飘雪，河里结冰，我们还打着赤脚在水里拖，凌冰刺脚刀样痛，一直痛到心窝里。等到爬上岸来，脚都冻木了，半天还开不得步。晚上，怕掉了树，赔不起，要睡在沙滩上守树。冷风吹进被窝里，夜夜睡到天亮被窝都还冒热。

到了热天，五荒六月河水毒，双脚成天泡在水里，烂得直掉肉。白天，沙滩上石子烫脚，晚上，河

面上蚊子咬人。一年四季，我脚上不是一团血糊糊，就是“娃娃张着嘴”。走路总是咬着牙、忍着痛，一拐一拐。

拖了一趟树，困心冲到口里来了。不等落坐，胡子桂又要我打地基、整米、挑谷，总没有一点空闲。

第一年过去了，胡子桂把算盘一打，对我说：你欠我十二石谷，今年本利一共应还二十四石，这一年工钱十六石谷，算你还了十二石谷的利钱，四石谷的本，还要欠我八石谷。我拿不出谷来，没有办法，只有忍气吞声再干一年。

这一年，我一个钱都没有领回家。第二年干到八月，我拖树受了热，病倒了。烧得炭火一样，人事不知。我堂客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冒钱诊病，又只得向胡子桂借了两石谷。这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病得九死一生的时候，胡子桂还怪我耽搁了他的工，你看气不气人！

第二年到年底，胡子桂说，去年欠八石谷，今年本利要还十六石，这年工钱又被他扣得一干二净，不剩一粒。他把算盘一打，发病借了两石，发病耽误工二十天扣一石一斗，掉了两根树扣一石，又欠他四石一斗。第三年干了大半年，就减租反霸斗

地主，胡菊生、胡子桂才稍微规矩些，要不然，还不晓得要抵债抵到哪一年！

一副棺材，胡子桂捞了一头牛，算了我本利四十多石谷，买了我三年阳寿。我们十个长工帮他拖三年树，赚谷六千多石，我帮他做的别的事不上算，光拖树就给他赚了六百多石谷。白白干了三年，我没拿回一粒谷，堂客坐月子向他借升米也不肯。三年劳役，胡子桂把我的血喝干了！过去拖树吃了苦，受了冻，如今我身体虚弱，时常咳嗽，畏寒怕冷，四十六岁就不顶用了。旧社会的苦楚，我一世都记得。

## 我立过活人碑

大兴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副主任 石庚全

要说我家过去受的苦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有父母和三个弟弟，穷得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一家人的生活，全靠父亲带着我们兄弟，佃种地主的六亩田。可怜六亩田一年只能收两千多斤谷，交地主的租就要一千二三百斤，加上国民党的苛捐杂税，就剩不得几粒谷了。家里常常没有隔夜粮。没有办法，我和弟弟只好随着母亲出外讨米。十五岁那年，我就开始帮地主做长工，起早摸黑，累个要死。

旧社会穷人真是灾难重重。做了几年长工，抽壮丁的事又来了。一九四三年，伪保长说我中了签，父亲一听这个信，坐不安，睡不宁，我堂客急得死去活来。你想，我去当兵，留下一家八口，怎么活得下去！我做长工的那家地主，听说我中了签，连忙退了我的工。我一回到家里，就大祸临门了。刚过端午节，伪保长祖士成就来要人。全家说尽了好

话，他临走，鼻子里哼了哼，说：“如果不去，就拿钱来买，没有钱就出八十石谷。”天啊！我家穷得吃了早餐愁中餐，哪里有八十石谷！左求情、右设法，后来伪保长祖士成答应减到二十一石。我们父子东奔西走，左挪右借，搭帮亲友帮忙，凑满了二十一石谷子交了。

交了谷子，满以为消了灾，免了祸。谁知过得不久，伪乡丁又来抓人了。我只好到姨父家去躲避。那种世道，又怎么躲得掉呢？“走了和尚走不了庙”，伪乡长硬逼着家里要人，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我们村里流行天花，死了不少人。我的一个隔房嫂子石伯泉三娘，得了天花病，半夜里死了。左邻右舍的贫雇农兄弟跟我想了一个办法：把三娘的棺材说成是我石庚全的，说我已得天花死了。父亲听了这个主意，心想：“活人怎能把死人当？”但是要保我脱身，又无别的办法，也只得同意了，一边棺材停在堂屋里，一边上报伪乡公所说石庚全已经病死了。伪乡公所不信，派乡丁来验尸，一走到门口，见到我一家大小哭得凄惨，我妻和子女都披麻戴孝，就信以为真。他们怕进去惹上天花病，不敢久停，夹起尾巴走了。可是伪乡长还是半信半疑，硬要亲自来看。我伯伯怕戳穿了更遭殃，给我埋了一

座假坟，立上石碑，上刻“石庚全之墓”。这样伪乡公所才免去了我的壮丁。我不敢露面，就离开了家，到望仙桥去做长工。父子几年不能见面，妻儿几年不能团圆。有家不能归，有亲不能投。说起来好伤心啊！我的妻子和两个小孩，都因饿中得病，无钱医治，先后死去了，真搞得我家破人亡。



解放后，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翻了身。我又重新成了家。现在，我的大儿子已经十一岁，读小学四年级了。两个小的，也长得很胖。一家团圆，日子越过越甜，现在，我是大队贫农、下中农协会副主任，是新社会的主人。今后我要更好地听党的话，站稳阶级立场，时刻不忘阶级斗争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！

# 一 張 筒 車

桂花大队貧农、下中农組长 章丘望

我们这里正在修电动抽水机，今后再不怕干旱了。老班子过去为了不干死禾，不晓得费了几多心血。只讲我们夹板屋场，现在谈起还伤心的，是一张筒車的故事。

二十年前，为了一张筒車，我们和胡家打了六年多官司，用了一千二百多块光洋，搞得我们夹板屋场十几戶人家一贫如洗。我们气得把这张筒車称为“穷車”。

夹板屋場本来有六部牛車，壬午年发大水，六部牛車一齐被水冲走。我们十二戶穷苦人家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离夹板屋场不远，丁家洲头上，富农胡仲民有一部筒車打水，灌的田多。水退后，我们商量着也做一部筒車，立在胡仲民的筒車下面。

新筒車终于做起了，大家满心欢喜。为了怕出麻烦，完工那天，请地方土豪劣紳胡泽南、胡春耕、

胡子尤到场，胡仲民也请来了，吃酒立约，约上写明了同意夹板屋场立这张筒车。

谁知立约不久，大恶霸胡泽南竟无事生非，挑起了一场官司。那时，胡泽南在伪乡政府当副乡长，又是圈子大爷，是胡仲民的“本家”。这傢伙专门包揽词讼，搬弄是非，恣意人家打官司，他自己从中得利。穷人恨之入骨，背地里叫他“胡拆烂”。

他见夹板屋场做了筒车，是挑起官司的好机会，就挑拨胡仲民说：“夹板屋场搞了筒车，你的禾都会干死，你还不去告他们的状！”其实，我们的筒车离胡仲民的筒车有十多丈远，对他的禾根本没有影响。胡仲民本来就恨我们，现在有胡泽南给他撑腰，就去找舅子曹运红商量打官司。曹运红也是一个大恶霸，是个专从鸡蛋里挑骨头的坏傢伙，只要有欺压穷人的机会，是从不放过的。这回，胡仲民来找他，他就满口答应，由胡仲民出面，把官司包给胡泽南去打。

只隔几天，法院一连几张传票传人，弄得我们慌了手脚，不晓得如何对付。只得东挪西借，凑齐了三百块光洋。自己不晓得打官司，就请了律师。开庭那天，两边都到了。法官想：照约上判，又会得罪胡泽南；按胡仲民的状判，道理上又说不过去。

就到现场来看，看到两张筒车都能转，这时法官想帮胡家说话也舌头不转了。

胡泽南得了钱，怎么交账呢？他下了毒心说：“法院没有判，夹板屋场的筒车也留不了！”这时，正好是五月干旱，田里禾苗正在拔节抽穗，正要筒车车水的时候，胡泽南一个晚上带着圈子会的大小喽啰，把我们的筒车砍的稀烂。水就是作田人的命，但是我们不敢得罪他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左想方右设法，凑了木料连忙又把筒车修好。

胡泽南见我们整好了筒车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晚上，又带着枪兵从河里驾着船上来，把我们的筒车浇上洋油，一把火烧着了。我们望着熊熊大火，心如刀割，看到有很多枪兵，又不敢拢去，只急得痛哭。

筒车被烧掉之后，我们夹板屋场的人更急了，又东奔西走，还想凑点材料再来整修。谁知胡泽南还不罢休，又叫胡仲民拆掉了自己筒车上的横枋、直枋，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搞坏了胡仲民的筒车，又一状告到长沙高等法院。传票又来了。当时，我们日夜车水还忙不赢，哪有工夫去打官司？可是，伪政府是帮地主办事的，不由我们不去。俗话说：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我们只好又凑钱

请律师。大家觉得胡泽南、胡仲民欺人太甚，便齐心协力，借的借，卖的卖猪，卖的卖生姜，凑了三百六十块光洋请了律师。这时，碰上日本鬼子来了，伪法官们逃得踪迹全无，这场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。我们的几百块光洋白白地进了“无底洞”。

这一年，把我们拖着打官司，两头背时：打官司用去很多钱，大片的禾苗也干死了，田里颗粒无收。有田的，把田卖了，没田的，只好去抬流轿。胡仲民的田虽然遭了干，但租谷还是要照收，吃亏的只是他的佃户。

这场官司使我们更看穿了旧社会的黑暗，看穿了伪政府地主恶霸如何欺压我们穷人。解放后，把胡泽南镇压了，为我们穷人出了冤气。“穷车”变成了“富车”。

## 两代聋子

官塘大队医生 胡伯奎

我和我爹都是聋子，不是遗传，而是旧社会逼的。

我爹名叫胡树林，打炸雷也听不到响。据说先前并不聋，二十岁上患了瘧疾病，冒得钱診，大病以后就聋了。我祖父怕他出外惹事，就在他背上挂了一张纸牌，写着“聋子”两个字。

可是在旧社会，就连聋子也安不得生。一九四一年八月，遭殃军（中央军）来了，到处抓伕，把我五十一岁的聋子爹也抓去了。走到谷塘，迎头碰上鬼子兵。遭殃军碰上鬼子兵，好象老鼠见了猫，一轟而散。我爹耳聋，不晓得出了么子事，肩上又挑着担子跑不动，就被鬼子抓住了。鬼子要我爹抬“太君”，“太君”象只大肥猪，又笨又重，我爹哪里抬得起？天上下着雨，路上又溜又滑，我爹一不小心跌倒了，差点把“大肥猪”滚了出来。“大肥猪”大怒，跳出来就狠狠地给了我爹两个耳光，还重重踢

了两脚。我爹很气愤，取下抬轿的扁担就向“大肥猪”打去，鬼子兵一拥而上，把我爹捆住了。丧尽天良的鬼子，把我爹用稻草包着，淋上洋油放火就烧。我爹只痛得在地上打滚。可怜我受苦一世的牵子爹，就这样死在日本鬼子手里！

就在同一天，鬼子闯进村里，见人就杀，见屋就烧，见东西就抢，见妇女就强奸。当时我带着全家人躲在东林寺冲里。晚上，鬼子走了，我回得村来，看到村里黑烟冲天，我的家被烧成一片灰土，我一家人急得直哭。

哭声冒住，凶讯又来，嫁在横坑的老妹胡翠兰，见鬼子追来了，逃避不及，两只手一手拖着一个小孩跳塘自尽了！

日本强盗烧死我父亲，逼死我老妹母子三人，烧掉我的房屋，害得我无家可归，无路可走。我恨得咬牙切齿，要去找日本鬼子拼命。我老婆孩子拖着我大哭，一家人又哭做一堆。第二天，我老婆只好带着孩子到外面去讨米。我逃向衡阳谋生。一路上又恨又急，中了暑，又不幸患上瘧疾，病得人事不知，耳朵又聋了！日本鬼子到了衡阳，衡阳呆不住，又逃到贵阳，一年以后才回来。我从小行医，这一回我成了聋子，就冒人喊我看病了，我只得想方

设法佃了二亩田作。交了租，自己沒剩下几粒谷，有时就捆着肚子在家里挨餓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犂子也见了青天。土改斗地主我听不到别人讲话，但也“犂子放大铗”，跑过去斗了地主胡秉华一顿。帝国主义杀害我父亲和妹子的大仇未报，我不甘心，刚解放，我就要兄弟“三炮子”去参军，好报仇雪恨，可是冒险得起。前两年，我崽胡壮国长大了，我又要他去参军，谁知他又体弱冒险得起。我的愿望还一直未能实现。不过祖国已经富强了，中国人民再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。

一九五五年，党把我送到春华山診所，要我仍旧行医看病，如今又调到了东林診所。要不是党，我这个犂子还有什么用呢？我永远記住我家两代犂子的命运，永远記住党的恩情，抱着“常将人病当己病，救得他身是我身”的态度，全心全意做好医疗工作。

# 我父亲的一生

大兴大队贫农 石云欽

我屋里几代都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。我的父亲石锡生，吃了一辈子苦，结局也很惨。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，从六岁起就跟地主看牛。长大了，就做长工，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晚上猪栏屋里眠。慢慢地我们兄弟姐妹多了，做长工的收入，不能维持下去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我们到外面去逃荒糊口。

我父亲见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好，经常暗自流眼泪，眼睛一天天地哭坏了，发红发肿，两三年时间眼睛瞎了。他急得喊天。我们安慰他老人家：“爹！我们记得你老人家的眼睛是怎么瞎的，一定想办法把日子过好。”我们为了帮父亲争一口气，那一年，向地主佃了几亩田种，指望多收点粮食。不料天老爷又来作对，旱得颗粒无收。交租不起，地主又夺回了佃田。

在旧社会，我们穷人头顶一块天，地上连一根

草也沒有。一天，我哥哥砍了地主山上几根小树作烧柴，地主知道了，硬要罰我们四桌酒席。十几块光洋一桌的酒席，哪里办得起！逼得一家人走投无路。可怜的母亲当时就急得晕倒在地，从此一病不起，活活急死了。父亲更是整天掉泪，唉声叹气，摸着打草鞋。我们就到处找零工做。

穷人多灾又多难，一九四三年，日本鬼子到了春华山，到处搶劫，杀人放火。我记得这年四月间，一个阴雨天，忽然听说：“鬼子来了！”我们把父亲藏在田家油坊，想出去找点东西回来吃。还走得不远，真的鬼子来了，大家都往山里逃。只见一队队“黄狗子”跃武扬威地走进村来。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怎么得了呢？七十三岁的老爹还在屋里！眼看鬼子进了屋。急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跑进屋去救他吧，一定会送死。我们弟兄只好抱头哭了起来。

那些黄狗子杀气腾腾地闯进了屋。这时，父亲摸着坐在床上，听到进来了人，其势汹汹，馬上把手抱住口袋。口袋里装的是他打草鞋积下的一点钱。鬼子进屋翻箱倒柜，沒有得到一点东西，一个鬼子看到我父亲紧抓着口袋，坐在床上打颤，就吊起了三角眼发吼：“媽的，钱大大的有！”就走向前

来抢口袋，我父亲抓着口袋不放。接着，鬼子抽出了腰刀，白光一闪，父亲“啊”的一声，便倒了下去。两块银洋叮啷一声掉在床上，鬼子马上抢去了。



可怜我父亲苦了一生，就这样遭了日本鬼子的毒手。父亲死后，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，也没有把日子过好，离不了讨米、做零工，忍饥挨饿。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，我们才过上了好日子。

## 識破地主分子的两副嘴臉

三联大队貧农、下中农組长 唐志文

我永远记得地主阶级的罪恶，记得我的血海深仇。过去，地主们对貧农好凶。如今，他们心里恨我们，表面上却假装笑脸，笑里藏刀。我们要提高警惕，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。

一九四五年，我家里穷得过不下去，我跑到浏阳去抬轿子，一年多没回来。谁知地主李从益趁我外出，姦污了我的堂客，生下一个小毛毛。他怕丢丑，就把毛毛搞死埋在灰堆里。我回家挑灰蹠禾，挖了出来。我没有地方出气，打了堂客两个耳光。谁知这一打招来了大祸。李从益怕把他的丑事传扬出去，怀恨在心。当天下午，他一面跑到我家拍桌打椅，吓唬我说：“你乱打胡家的女子，一碗油端在手里，要小心点！”又使稳身计要我在家办酒席赔礼；一面串通伪乡长胡春耕、伪保长胡南卿、劣紳雷玉堂、匪首胡細毛等，带着圈子会的一大群人，借口我打了胡家的女，上門来打人。我母亲看到来

了“客”，进门就喊他们吃饭。“吃饭是小事，打人是大事”，这班狐群狗党来势汹汹，不容分说，一拥上来，把我掀倒在地，接着拳打脚踢，棍棒齐下，橛子、椅子、吹火筒、锄头把，落雨样朝我身上打来。当时是热天，我光着身子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被打得遍体鳞伤。只剩一口气了，他们还不放手，又灌粪泥水。我妈妈边哭边求情，这班畜牲一齐吼叫：“你这老货也不要命了！”伸拳要打我母亲。这班傢伙临走还威胁说：“三天后不请酒，又是现的！”

把我打了个半死后，李从益把那班傢伙请到七亩墩茶铺里饮酒作乐。隔壁邻居唐桂秋见我挨了冤枉打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也做得太过分了！”这话被他们听见了，他们又把唐桂秋抓住毒打一顿。

第三天，李从益又把那班狐群狗党带来了，硬逼着我借了米，买了菜，办了三桌酒席给胡家“赔礼”。三桌酒共花了二十多石谷，害得我又背上了一身债。这班畜牲打了我，还不罢休，又逼着我离婚。胡细毛把拳头扬到我脸上：“你想活命就离婚！”他们又诱骗我堂客说：“你男人动了点打，活不成了，你跟着他再无益处。”他们写了离婚字，捉着我的手按了手模。就这样，我又被迫离了婚。

我有冤无处伸，有苦无处诉，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，吃了几石谷的药，才把伤养好。直到解放，我才报了仇，出了这口冤气！地主阶级被打倒了，坑害过我的，除了李从益，胡春耕、胡南卿、雷玉堂、胡细毛都被镇压了。

李从益留下了一条狗命，虽然表面上老实了，但是兽心未改，玩尽花样，他伪装好人，见了干部点头哈腰，甜言蜜语，把干部请到家里，拿盘摆碟，请酒请饭，“热情”招待。这样一来，有些人受骗了，错把他看成“开明地主”，放松了对他的管制。他骗得信任之后，他就露出强盗嘴脸来了：他大做投机买卖，开酒轴厂，得暴利五百多元；他反攻倒算，霸占集体财产，把大队的一张大柜，一张书桌，一杆大秤，一个篮盘搬到自己屋里；他还破坏生产。一九六三年生产队的一头耕牛，也被他喂死了。害得队上一部分田没有赶上季节，减产一万多斤谷。他对待干部是拉拢，对贫下中农就打击。土地改革的时候，贫农张申庆当了干部，他千方百计地去拉拢，请张申庆吃酒吃饭，百般奉承。后来，张申庆没有当干部了，他一下就变了脸，想方设法去打击他。

李从益表面上装成笑脸，实际上是个强盗，是个名符其实的“笑脸强盗”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被推

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，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阶级斗争，不可以忘记无产阶级专政。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，提高警惕、识破地主的两副嘴脸，不让敌人钻空子。

如今，我们成立了贫农、下中农组织，我当上了组长。我们贫农、下中农要扎紧把子，把敌人管制起来，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守法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，只要我们团结得好，他们如果再敢破坏，我们每人吐一口口水，也能把他们淹死！

